

缅怀植物考据学研究的 引路人吴征镒院士

高明乾

(1938~)，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老先生伟大的业绩，高尚的人格，卓越的学术思想，楷模的学术行为，影响着、哺育着一代代植物学人。他是天上的新星，人间的良师。他的辞世，使我国痛失泰斗，无可弥补！于今追缅大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英魂不死，千秋永祀。

我长期从事植物古汉名训诂研究，是在吴老的影响下、指引下开展的。我不是他的门生，也是他的门生。因为，我的老师徐粹新教授是周铉教授在华东师大的学生，周铉教授是吴老的第一代研究生。因此，植物学的知识、学术思想、学术行为是代代相传的。我也是受益者。

1988年吴老曾在周铉教授的陪同下到我们学校讲学（见照片）。他那精彩的报告和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我们颇具教益意义。

吴老说：“搞植物分类少不了上山，避免不了走弯路、摔跤！不要怕吃苦。”他是这样实践的，也是这样教人的。我们按照他的教诲，经常上山，跑遍了中原大地，建立了中原最大的植物标本馆。

吴老赞誉的名言“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对我们影响至深。我们品味着教诲的涵义，认真地思考着我们应该从事的研究工作。

吴老说：“你们河南出过一位大植物学家吴其濬，很了不起，他写了《植物名实图考》与《长编》影响深远。你们要继承他的事业，在植物学领域多做些贡献。”这是对我们的鞭策与鼓励，更是给我们指出了研究的方向。



吴征镒院士与河南师范
大学植物学教研室
教师





吴征镒院士与河南师范大学植物学教研室教师座谈



吴征镒院士与河南师范大学徐粹新教授

吴老主编的《新华本草纲要》是我们的常用书，他很注意植物古名和别名的收录，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他对《滇南本草》的考证，澄清了其中药用植物的名称是现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哪种植物，然后研究其药理、药性，取其精华，给我们了很大的引领作用。在吴老学术思想的指引下，我们选定了“植物古汉名训诂”的研究课题。这是属于植物考据学的一个课题，也是吴老给以正名的。

这一研究开始后，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记述了很多植物，这是我们的先民在利用这些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民族植物文化。但是由于朝代的更替，语言文字的演变、地域方言的差异，使很多植物的名称发生嬗变，造成植物古今名称不一致，且同物异名及同名异物者颇多，至今仍有许多植物中文名称混乱，难以分辨。影响古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也需要和世界植物学相沟通。

《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且我国素有“一物不解知，儒者之耻”的传统。给植物正名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

宋·罗愿曾指出：“草木所以难言者，以其名实相乱，每每如此。”清·吴其濬曾感慨地说：“称名亦无确诂，盖方言侏，难为译也。”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也因为整理中国植物“邦名”而发感慨：“整理旧籍，视若平易，行之则难。非经费之难，而人才实难。亦非人才之难，而热心毅力之为难也，惟其人多读古书，不能从事。读书而无科学之素养者，犹隔阂也，需时颇久，成书较缓。此非目光短浅，且暮图功者，所愿为矣。”

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在药物正名、释名，兼陈地方名、异名方面，对植物正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的名著《植物名实图考》，考证了众多植物的名称和相符实物，兼及实用，“以证诸今”。鸦片战争后，西方植物学传入我国，有志学者从事了一些植物古今名称考证和外域植物名称的沟通以及中医药的原植物鉴定等方面的考证工作。

给植物正名，是历代植物学家都很关注的事情，也是吴老奋力以求的事情。吴老说：“整理古籍中植物名称，辨清真伪，考订名实相符的正确名称，需要查阅大量古籍文献，进行甄别、考证，要付出分疏、辨析的艰辛努力，要有甘于清贫的执着毅力，方可见成。这样的事，虽任重而道远，

也总会有仁人志士投身其中。”

吴老提示我们要继承吴其濬先生的事业，多做些贡献，我们就想在《植物名实图考》的基础上再发展一步，搞出《植物古汉名图考》“承传古今、沟通中外”。这是吴其濬先生难以完成的，因为1848年以前西洋的现代植物学还没有传入我国，受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给我国的植物加注拉丁名。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有勇气来担当。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班人，开展了植物古汉名训诂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困难之多，耗时之长是当初难以想象的。我们要几十年埋头于古书堆里，甄别与考证，辨析与爬梳之艰辛，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中途有退出的，也有不少坚持下来的。

“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正是吴老的名言支持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终于获得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项目编号30370864），获得了资助。于2006年6月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植物古汉名图考》。收录了植物古汉名4394个，分属177科，附图789幅，800种，计80余万字。

《植物古汉名图考》出版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好评，该书被2006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评为百佳书之一，也引起中科院植物所的重视，2007年5月11号，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王锦秀博士等一行四人特意来访，座谈中除了谈论《植物古汉名图考》出版的事情外，他们特意介绍了我们国家正在搞一项国务院的重大文化工程（新出联（2006）12号文件），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项目，编纂《中华大典》的事情，《生物学典》是其中的一卷。他们特邀我们参加这一编写工作，还特意说明了“我是代表吴老来物色人选的。”我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老伴得了脑溢血，正在治疗中。

此后，王锦秀博士在2007年6月20日的来信中说：“上次在新乡向高老师提及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纂，承担单位已经确定，是昆明植物所和北京植物所两所单位，但需要全国高校的专家协作，不知您和您的学生是否还有兴趣？吴老25日要在昆明召开《植物分典》启动会，如果您或卢教授还愿意参加工作，吴老会给您发出邀请函，占用我们北京植物所一个名额；如果您没有时间，或许可以安排您的学生或同事去学习，往返费用由北京植物所承担。”

我们学校认为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情，有机会参加此项编典工作，感到十分荣幸。因此我们决定组织一班人参加。一定尽其所能高质量地完成我们承担的编典任务，力争交一份让国家满意的答卷。自2008年我们参加编典以来，至今已第7个年头了。

有感于高龄的吴征镒先生担任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日夜操劳，不胜感慨，曾写诗一首：

赞吴老主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

年逾九旬吴征镒，编典又挂帅子旗。治学精神天可鉴，鞠躬尽瘁而后已。

植物考据谈何易，通古博今几人欤？传世之作留后人，功高盖世孰能比。

（2010年8月8日于滇池度假风景区怡心楼）

此后，我们挤出时间又编写出了《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编》的初稿，出版前我们想请吴老给我们的新书写序，又担心吴老年事已高不一定能如愿。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吴老表达了我们的



想法。结果，吴老爽快地答应了，在昆明植物所吕春朝研究员的协助下吴老给我们的新书写了序。

《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编》2013年1月终于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植物古汉名1789个，分属147科，633种，附图633幅，计64余万字。这件事说明了吴老那种襟怀坦荡，甘为人梯、提携后学的胸怀，我们感激万分。

吴老曾谦逊地说过：“我的能力有限，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后来居上，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多么感人肺腑呀！

吴老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感人的事迹多不胜举，贡献之大难以述说。我们谨以这一研究的事例，缅怀植物考据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院士，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附：《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编》序。

序

从学界认为成书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到晚清吴其濬真正有植物学意义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时跨两千多年，记载植物数千种。由于分类方法各异，植物称谓多样繁杂。性、味、主治相同的植物常被放在一起，平添了许多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名称，旷日持久，代、充、冒、假、讳、隐的品类和名称越来越多，名称和实物的混乱，成为“通病”。

在中国医药宝库里，植物药数量最多，植物性药有数千种，即使掌握了常用中药的大部分，也绝非易事，何况那近万种的草药，正名工作仍属必不可少。近代植物学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着手于植物的考据研究。然，此事“需时颇久，成书较缓”（钟观光语）。我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与匡可任、蔡德惠等考据整理《滇南本草》，历时三载也就做了25种植物的考证，所撰的《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成为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如今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考据研究成为编典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或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整理古籍中植物名称，辨清真伪，考订名实相符的正确名称，需要查阅大量古籍文献，进行甄别、考证，要付出分疏、辨析的艰辛努力，要有甘于清贫的执着毅力，方可见成。这样的事，虽任重而道远，也总会有仁人志士投身其中。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多位教师，执教同时，于2006年编纂出版《植物古汉名图考》后，今又续编《植物古汉名图考补编》，他们的执着对承传古今、贯通中外无疑是一种重要贡献。在《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编》出版之际，作序为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征镒

2010年11月15日于昆明

